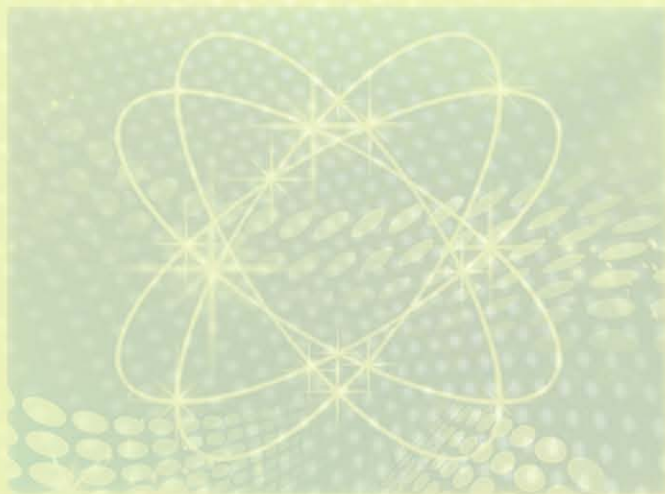


# 重庆评论 2010

周晓风 主编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评论2010 / 周晓风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9-06170-8

I. ①重… II. ①周… III. ①文艺评论—重庆市—当代—文集 IV. ①I209.97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9391号

## 重庆评论2010

CHONGQING PINGLUN 2010

周晓风 主编

---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秦 琥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陈 永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50千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170-8

定价: 32.8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重庆评论2010》编委会名单

主管单位: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编辑出版:《重庆评论》编委会

### 《重庆评论》编委会

顾问:罗中立

主任:王超

副主任:杨矿 周晓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林 王定天 刘明华 朱丕智 张昌达

陈兴芜 周滢劼 虞吉 戴伟 戴雄

主编:周晓风

副主编:朱丕智 周滢劼

编辑:秦琥

装帧设计:陈永

# 目 录

## CONTENTS

### ·理论探索·

#### 中国现代文论的重估与民族话语重建/王本朝/3

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李 怡/13

走向生态诗学:中国现代诗学一个可能的突破方向/代 迅/18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之意识形态说批判/朱丕智/22

日本近世文论历史扫描/靳明全/37

### ·诗学研究·

#### 论“新时期”诗歌与“新来者”/吕 进/49

偏于一极的诗歌时代/蒋登科/60

西潮涌动下的东方诗风——“五四”诗歌翻译的逆向审美/熊 辉/65

论穆木天的《谭诗》/刘 静/78

新诗文体的“应变”与“不应变”/张中宇/84

符号论与主客观化合论视角的抒情诗

——兼及鲁煤文学语言的美学个性问题/赵心究/89

“把欢乐还给孩子”——论高洪波儿童诗/彭斯远/99

第十五行“十四行诗”——林子诗歌《给他·只要你要》的版本问题/凌孟华/107

从爆破到建构:现代诗学话语机制的转换

——“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评述/向天渊 杨晓瑞/116

目

·区域视野·

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周晓风/ 123

夔州诗的“奇”与“真”——兼及诗仙与诗圣/郝明工/ 135

罗明佑的“战都行”与《战都行》/余纪梅琳/ 139

重庆抗战电影的镜像表达/周晶/ 151

·作家作品·

20世纪50年代的阿Q——“十七年”文学“农民”话语一例个案的分析/李祖德/ 157

在文学与历史的交融中享受美的盛宴——读王雨新作《填四川》/李敬敏/ 171

《长生殿》与《诺桑王子》思想内涵之比较/谢真元/ 177

·语言与传播·

论抗战文学的大众传播学特征及工具理性样态/张育仁/ 191

“五四”前后激进主义思潮演进的语文学观察/赵黎明/ 203

归化与欧化——试析清末民初翻译文学语言的建构倾向/邓伟/ 216

沉思·创造·坚守——读《尹韵公自选集》/董小玉/ 228

·影视论坛·

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事”的原初性建构/虞吉/ 233

视觉直观与心灵品悟——再谈影视与文学的审美品格与审美特征/向怀林/ 242

论谢晋电影的“希望”主题/李红秀/ 248

·艺术天地·

读罗中立风景画/王林/ 257

中国画形态及其观念中的哲学价值/龚文/ 270

中国美术观：中国美术的自主表达/邱正伦/ 275

视角转换与本体追问——西方艺术理论阐释下的中国书法/张兴成/ 278

魏靖宇笔下的三峡/熊少华/ 292

后记/编者/ 301

致歉/《重庆评论》编委会/ 302



理·论·探·索

LILUN TANSUO



# 中国现代文论的重估与民族话语重建

王本朝

##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现代文论失语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引起文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学术机构和单位的组织和参与,也有刊物和出版社的互动与配合,还有众多名家和新人的联手造势<sup>①</sup>,众声喧哗,余音袅袅,在新时期文论界营造了“文论重建”话语。让古代文论彰显当代价值,使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对接,这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者一直追求的目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古代文论研究应该与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联系起来,有的甚至提出,可以用古代文论体系的框架来编写文学概论,应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纳入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之中。<sup>②</sup>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认为古代文论是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学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自然离不开对古代文论的融解和吸收。但人们又同时认识到,在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之间似乎还存在一道历史的沟壑。搞当代文论研究的,或者囿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传入的理论模式,或者面向西方,只在必要时引用几句古代文论

<sup>①</sup>1996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陕西师大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地讨论,还出版有论文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东方丛刊》等刊物还组织了专栏文章,对这一课题展开了持续研究。前后有钱中文、童庆炳、杜书瀛、张少康、蔡钟翔、陈良运、畅广元、陆贵山、王元骧、曹顺庆、党圣元、李春青、李衍柱、顾祖钊、蒲震元、赖大仁、蒋述卓、劳承万等发表文章参与讨论。

<sup>②</sup>《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载《文史哲》,1983年第1期。



作为补充和印证;搞古代文论研究的,则大多从理论批评史的角度着眼,就古论古,与当代多有隔膜。于是,如何挖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特别是贯通古今,使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当代性和生命力,使当代文论能够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民族传统,就成为文学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sup>①</sup>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不但要运用传统的方法,而且还应运用比较的方法<sup>②</sup>,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的二难选择。如果保留古代文论所特有的概念、范畴和其深刻性、独到性,就很难使其进入现代学术话语系统,因而很难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如概念的明晰性、逻辑的严密性等等,如果以现代研究方法、话语形式对古代文论进行梳理、阐释,则又很难保留其独特性,从而使之成为印证某种西方理论方法的材料,出现生搬硬套、对号入座。于是,还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国文化诗学”的构想,在吸收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建构起一种具有操作的有效性并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方法论。<sup>③</sup>

这些看法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古代文论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上,没有将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阐释为一种对抗和异质关系,它的影响自然也没有跨出古代文论界。1996年的“西安会议”是一个转折点,会议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中心议题,检讨了近百年来古代文论研究和现代文艺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和存在的问题,对中国传统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及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的重要意义以及什么叫做“现代转换”,“如何转换”,“转换的目标、方向和方法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命题的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文论界提出并讨论方法论、主体论之后,再次点燃并激活了人们埋藏已久的理论热情,并引出不同的观点和持久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涉及到能否转换和如何转换。传统是被建构起来的,古代文论也是在现代中建构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现代文论的发生,就没有古代文论这一概念。古代文论可否被转换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传统向现实存在而开放,它的意义也不断被现实所阐释和建构。至于如何转换也是人见人殊,不同历史语境、不同解释者会有不同看法。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的提出,基于对中国现代文论的评价与重估,以及未来中国文论的重建的不同认识,是对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焦虑,由“失语”引出“转

①郁源:《古代文论研究方法 with 观念更新》,载《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②杨明照:《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③李春青:《中国文化诗学论纲——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构想》,载《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

型”的价值诉求,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视为建设中国文论的重要力量。它认为近百年来的西方文论带来了现代中国文论的“断裂”和“失语”,“失语”是指失掉了自我表达的话语方式,话语是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维、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20世纪中国文论从西方拿来了各种主义,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苏俄的别、车、杜,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一而足。我们不仅拿来了,而且还成为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学到了别人的理论话语,却失去了自己原来的理论语言,基本上只能借用西方的话语说话,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中国的学者就不会说话了,中国文论长期处于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尽管我们能够体察到自己的存在,却无法言说出自己的存在,一旦我们离开了别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这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贫乏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表现。<sup>①</sup>

事实上,20世纪以来对传统文论的关注和研究并没有被忽视或间断过<sup>②</sup>,传统文论的现代价值也一直被阐释和重视,“古为今用”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待传统遗产的基本原则,将古代文论作为遗产加以继承与发扬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但该论题的提出却有着不同的语境、内容和目标诉求,特别是在一个不断开放与改革的时代,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焦虑和价值迷茫,使“本土特色”、“民族气派”、“国学传统”凸显出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 二、新传统:重估中国现代文论

“失语症”所指的是中国文论的话语方式,而不仅仅是观念和事实。它的提出有特定的含义,也有西方后殖民主义背景,它的前提就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重估,认为它是西方化的话语表达,没有自己的声音。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这需要我们认真检讨和回答。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有着多种资源和价值形态,相对于现代文论的西方资源,古代文论的确处于比较边缘或弱势的位置,在文学批评的话语里也没有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按理说,古代文论之所以能为今天所用,就在于它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然而中国现代文论并不是从古代文论延伸过来的,而主要是

<sup>①</sup>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化话语》,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sup>②</sup>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魏中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西方文论话语的移植与创造,但现代文论依然是中国文论而不是西方文论,也不是古代文论的现代阶段。古代文论成了现代文论的重要背景和知识资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不是连续与断裂的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历史和传统在时间的链条里是无法割断的,但也不可能无时不在,缺席和失位是完全可能的。即使进入到现代文论中的古代文论也已不是纯粹的古代文论,而成了现代文论的构成内容。所谓现代文论被西方文论所取代也是不准确的判断,中国现代文论中的西方文论也应该看作是现代文论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文论话语,更不是西方文论。中国现代文论是一种有着自己独立传统和特点的文论形态,或者说是话语方式,它有厚实的古代文论成分、基因或资源,但不属于古代文论,也有鲜明的西方文论影子或话语,但也不能将它等同于西方文论。它是它自己,谁也不能取消或代替它的独特意义和存在。

中国现代文论从来没有拒绝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的进入,由于受到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现代中国文论的发生不得不以挣脱传统、移植西方为其发展道路,无论是偏向西方话语还是传统表达,都是它自己的主体选择和创造实践的结果。思想启蒙、社会改造和历史进化是现代文论话语建构重要的历史法则,对传统文论的否定和批判也是它不得不为之的话语选择。中国现代文论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等西方文论话语作为基本的表达方式和意义内涵,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为圭臬,难以听到中国古代文论家的声音,割断了与传统文论话语的整体联系,从而走向了全盘西化和全盘苏化,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在今天也是不难理解的,也不存在什么方向性错误,而是有其历史的规定性和时代的合理性。我们不能以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在现代文论中所占的数量比例和时间长短论高下对错,也不能以今天之是论昨日之非,给历史匆忙下结论,作出简单的非历史主义判断。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晚清以降,古代文论的“重感悟、呈诗化”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社会对文学的诉求,无法满足觉醒了的现代知识分子表达个人思想情感的需要,中国文论必须要有新视野,寻求新资源,建构新话语。黄遵宪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力主“新小说”观念都是为了改变文论的困境,将文论话语引向社会担当和自由书写之路。王国维也尝试着将古代文论实现现代转换,他的《人间词话》将西方哲学美学理论与传统文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独特的“意境说”,又以“意境”为中心概念和最高审美范畴,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关于意境、写境与造境、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诗人之境与常人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一系列文论见

解,关涉到文学本质论、作品论、作家论、表现论、方法论、批评论和发展论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文论问题,是西方话语,也极富中国话语特色。“五四”时期的胡适主张“国语的文学”,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将文学纳入社会与个人、写实与俗白的价值规范,它们大胆移植了西方文论的思维观念和话语方式,同时也有传统文论话语的渗透。胡适的国语文学,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特别是在走向现代进程中,文学抛弃古典的僵死的文学语言而采用现代口语的经验。针对中国文学“泥古拘古”、“不古不今”的沉闷现状,他提出了“文学改良”主张。认为白话是文言的进化,白话才能真正达到表情达意的效果,才是“活的文学”。元明清的白话小说和戏曲就以白话为主要表达手段,只不过没有像胡适那样认它们是“中国文学之正宗”。<sup>①</sup>可以说,胡适的国语文学观,着眼于新文学的语言改良,有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也有传统文学和文论的支持,是西方话语,但也有中国文学的历史依据,是带有现代性的中国话语。

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论”,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确立文学的价值,提出文学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社会文学。<sup>②</sup>他限定新文学的修饰语是“国民”、“写实”和“社会”,显然,陈独秀已经注意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有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基础,新文学是现代“国民”和“社会”的文学,它以真实、鲜活为艺术手段和目标,担负着不同的文学责任和功能。这样的文学观念特别是二极对立的话语表达,显然是西方方式,但也不能忽略儒家功利主义文论的影响。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为新文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认为新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和反对“非人的文学”,“人”成为了新文学的价值中心。这里的“人”有动物和从动物进化的两面性,也就是兽性与神性,灵性和肉体性。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有西方新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人的发现”思想的影响,也有言志文学传统的痕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论,无论是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论,还是以胡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以及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文论,它们都是在特定的阶级和政党、历史与时代背景中建构起来的话语表述,有西方文论话语的模仿,也有传统文论观念和话语的承传。自由主义文论来自西方话语,但倡导者大都是大学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有着良好而扎实的国学基础,虽受

<sup>①</sup>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sup>②</sup>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过西方教育和自由思想的影响,但传统文化依然是其思想底子。朱光潜的文论与美学相通,他的美学以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克罗齐的美是直觉与表现为哲学基础,但他对传统诗论非常熟悉,融合古今,贯通中西,既强调自由人性,又偏重形式美感,追求理性分析与直觉体悟相统一的话语方式。宗白华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诗论、画论、书论、乐论和戏曲论,将古代文论中的理趣、意味、神韵、风骨、飞动、空灵等概念术语转化为现代艺术批评,建构了一套现代文论诗性话语。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论继承鲁迅传统,强调现实主义的体验性、启蒙性与战斗性,反对形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它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胜利”命题的探索和转化,同时还有传统整体性思维特征的承传,强调人与万物共同作为感性的存在,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与相通性,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智、情感、意志等消融人与天以及自己与他人的界限,实现主客体相即不离、融合无间与交感互动,如同刘勰说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境界。<sup>①</sup>但胡风又是现代的,他的现实主义文论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面对着残酷的民族矛盾,人民有着精神创伤和坚强脊梁的双重性,这也是他的话语建构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他自己经常称之为“社会情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承了中国文论中的重教化传统,同时吸收马列主义文论思想,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功能,成就为典型的中西融合文论话语。20世纪5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文论被批判,胡风思想遭到清算,苏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论一枝独秀,虽对写真实、典型化、形象思维等有过讨论,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在“文革”期间所出现的“根本任务”、“三突出”等政治工具主义文论,也是一套推行文化专制的文学政策,与苏俄文艺政策和传统文以载道论都有紧密关系。

可以说,现代中国文论在吸收、转化和超越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新传统,它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变革、探索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既继承又发展古代文论,借鉴且融合西方文论,不断追求文论的现代性、科学化和实践化的过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它更多地吸纳和继承了西方文论,但古代文论中被认为有价值和有生命的东西也被适时而合宜地传承下来,鲁迅就深深地感觉到,“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sup>②</sup>,这也说明在新文学与旧文学,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之间,并不存在像我们今天这样感受到的距离和差异。尽管中国现代文论热烈而痴狂地去追新逐异,袭用西方文论话语,但它还是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sup>①</sup>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48页。

<sup>②</sup>鲁迅:《准风月谈·扑空》,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

### 三、话语重建：立足中国现代文论

重估中国现代文论,倡导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借以诊断和救治其病症,由此进而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构想。中国文论话语可以也应该不断进行重建,但我认为,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不能被否定和解构,而应在承认和阐释它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进行话语重建。“建设新世纪文论只能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而无法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sup>①</sup>中国现代文论已经形成了一个新传统,这个传统本身是不能被遮蔽和忽略的。今天我们要进行文论重建,需要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现实,那就是我们同时拥有古代、现代和西方三大文论传统,它们都已融入我们的文学和文论的血液,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论也都曾产生过还将继续产生影响和作用。所以,重建中国文论必须面对并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古代文论的现实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曾经参与并进入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和实践,也应该成为重建中国文论的重要内容和话语策略。

胡风在描述“五四”革命文艺时,认为它已形成一个“新传统”,是在“接受世界革命文艺的经验来认识(表现)民族现实而形成的,也是通过民族现实的认识(表现)去融化世界革命文学的经验而形成的”<sup>②</sup>。这里,他提出了世界经验与民族现实只有经过它们相互之间的“接受”、“认识”和“融化”过程才能形成新传统,这也可作为建设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重建中国文论,对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也应采取“接受”、“认识”和“融化”的方式,经过“古今融会”和“中西化合”的复杂过程。有学者提出,应先承认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和独立性,摆脱“以西释中”、“以中注西”的单向偏重,再以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为本,回归到传统文论的语境之中,摆脱西方文论话语的外在影响和内在植入,用传统的注、疏、传、校、训的方式来介入中国古代的文论研究,直至打通古今文论,展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sup>③</sup>在我看来,承认古今中外文论的异质而融合成新文论,不能忽略中国现代文论这个基础,因为它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无论是对传统与现代完成“消融”,还是对中国与西方实现“整合”,要跳过现代中国文论

①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②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载《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页。

③曹顺庆、杨一铎:《立足异质,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传统,都是不明智的,它已经成为了中国文论最直接的历史和现实,尽管这个新传统本身也是有问题的,还曾发生过(也将继续发生)激烈的变革和冲突,消耗了文学生产力,出现了文论一体化的霸权话语。但历史不可回避,传统不可忽视,不同观念和话语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才可能创造新思想,产生新理论。

一种文论的存在可以是一套观念性的知识,也可能是一种思维方式,还可能是一套操作方法。它的产生有着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可从哲学或其他思想文化里演绎出来,如“形神论”、“文气说”、“自然说”等;也可从既有文论引申、嫁接出来,如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还可借助对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解读而提炼出来,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说”、陆机的“缘情说”、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等,现代西方文论中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等也大都是通过文本的细读而提炼出来的。无论是演绎、嫁接,还是提炼,只是对象和过程的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都需要有对象(理论观念或思潮作品)。现代中国文论的概念或范畴虽然不完全来自独创,但都经过了对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重新阐发熔铸,使之蜕变为新的学说,有了各自特定的内涵和意义,有的虽来自西方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论的含义,虽是同一话语,却有不同意义,也有一定的原创性。有学者就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就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它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变”为目标,以“告别传统”为标志,体现了中国文学家对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的感受和情绪”,与西方现代主义具有共同的“性质”,但又表现出与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更多的“相近的特性”。<sup>①</sup>再如“先锋文学运动”,中国“五四”新文学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都同时产生于20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如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但中国的先锋精神却混迹于浪漫主义的恶魔性、唯美主义的颓废性以及现实主义的启蒙和批判,甚至还有自身文化传统中的反叛因素,杂糅成一种以反叛社会、反叛传统为主要特点的文艺思潮,其先锋品质却不是单一的构成。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广泛的社会整体运动中的一翼,与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整体性地参与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其影响的深广不局限于文学,“五四”时期的中国先锋运动要比西方的先锋运动更具有对社会传统的颠覆性。所以说,中国与西方

---

<sup>①</sup>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载《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的先锋文学运动既有同步,也在同步中追求差异。<sup>①</sup>中国新文学文论中的“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也有着自己特定的意义内涵,话语是西方式的,但意义指向却有本土性。<sup>②</sup>

中国现代文论传统是在一种力量、两种资源、三重语境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力量是指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两种资源是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三重语境是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个人和文学与审美。中国现代文论传统呈现出现实性、战斗性和审美性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主要是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体现出来的,胡风认为:“对于一代文艺思潮,不能仅仅从理论表现上,更重要的要从实际创作过程上去理解;或者说,理论表现只有在创作过程上取得了实际意义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代文艺思潮的活的性格。”<sup>③</sup>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现代文论是相互统一的。有人诟病现代文学批评使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些西方概念,没有运用古代文论范畴,实际上这是由新文学创作实践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文论如气韵、比兴、形神、风骨、自然、意象、意境等概念和范畴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理论结晶,是在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与古代文学创作有历史的同构、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它们并不适应新文学创作,如果用它们来解释新文学,就会捉襟见肘,显得生疏而怪异。古代文论是中国文论建设的知识资源和文化精神,但今天恐怕也很难再回到古代的思维状态,我们既缺乏那样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如此那般的生存体验,更不可能出现那种文体的社会化创作,也就难以普遍采取古代文论的话语方式。我们也不可能为了古代文论而去发掘古代文论,我们应有自己的现实立场和主体坚守,所以,无论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西方文论的本土移植,都必须考虑到现实需要和主体选择。我们知道,社会现实和主体选择才是决定人们思想观念最真实的力量,古代文论要转化中国当代文论,无论是作为知识背景,还是话语方式,或者是精神价值,都需要经过中国社会现实和主体的选择。

中国文论的重建不可能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也不可能照搬先在的理念设计,而应立足社会现实和文学实践,以现代中国文论为基础,整合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创造具有现实性、表现力和主体性的当代文论。现代中国文论是其基础和前提,文学实践是其动力机制,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是其知识视野和思维方式。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保持中国文论与古代文论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但崇古、复

①陈思和:《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6期。

②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载《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2页。



古或仿古也是不可取的,古代文论是中华民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话语方式,继承与发展古代文论可以凸显中国文论的连贯性和民族感。但是,无论是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不应该成为中国文论话语选择的支配力量,面对不同价值和思维方式的文论话语,重建中国文论应该坚持主体性、创造性和实践性的话语原则。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